

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

总主编 江 铭 谢长法

THE HISTORY OF
CHINESE
UNIVERSITY EDUCATION

中国

大学教育史

刘少雪 著

山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
总主编 江 铭 谢长法

■ 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

G64

170-6

中国大学教育史

刘少雪 著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大学教育史/刘少雪著.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5
(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

ISBN 978-7-5440-3302-2

I. 中… II. 刘… III. 高等教育—教育史—中国 IV. 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4224 号

中国大学教育史

责任编辑 张沛泓

复 审 王佩琼

终 审 王宇鸿

装帧设计 薛 菲

印装监制 贾永胜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印 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

开 本 787×960 毫米 1/20

印 张 11

字 数 224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0-3302-2

定 价 22.00 元

序

foreword

加强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是开拓教育史研究的新途径，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著名教育史学家舒新城就曾“将目次拟定，材料集好”，拟就“初等、中等、高等、师范等教育专史”先做系统之研究，“再就各专史而别辑百万言之《近代中国教育通史》”，但终因忙于其他编辑事务，“为时间所限制”，“不能专力于此，只以余暇整理《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近代中国留学史》两册”。^①今天，随着研究条件的改善和研究队伍的壮大，在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中，相辅相成的通史、断代史以及专史都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就总体而言，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尤其是专题研究仍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组织编写出版《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就是出于以上认识所做的一次初步尝试。而为了既较为全面地反映中国教育发展的基本概况，又能达到深化教育史研究的根本目的，经过斟酌，本丛书确定从学制系统内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和学制系统外的有关教育两方面组织选题。

对学制系统内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进行系统的研究，有助于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国教育的历史演变，更好地揭示不同历史时期教育发展的规律和特征。

据传，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即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至汉代，学校教育也得到更快的发展，特别是官学制度，更是为我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经过魏晋时期教育的多元发展，至隋唐、宋元时期，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已臻完备。然而，这种较为完备的学校教育不仅就形式上仅有“小学”、“大学”之分，而且至明清时期，随着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不断加强，也逐渐由繁荣走向衰

^① 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稿选存》，上海中华书局 1936 年版，“叙”。

败。历史进入近代，伴随着社会的变革，教育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从洋务学堂对封建教育体制的冲击，教会学校客观上对中国学校教育近代化发展所起的特殊促进作用，到甲午战争后发展学校教育、广开民智被视为救亡之道、富强之本，以及“新政”期间以建立学校教育制度、兴办新式学堂为中心进行的教育革新，使清末的学校教育在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的冲突中，逐渐抛弃传统，走向近代化。民国成立后，随着“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对封建复古主义思潮的彻底抨击和对资产阶级新教育的大力倡导，随着中西教育交流的不断加强，西方有关的教育理论、教育方法乃至教育制度逐渐被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对传统教育的摒弃和对现代教育的鼎新也加快了步伐。虽然，在这一过程中，湍流急急，步履维艰，但在一大批爱国的教育家筚路蓝缕的努力下，中国学校教育的近代化仍在一步步前进。



学制系统外的有关选题可谓至繁，但基于教育史界研究的现状并尽可能与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相匹配，经过筛选，我们确定以教育史界研究薄弱的古代教化以及女子教育、近代留学教育作为探讨的主要内容。

中国自古即重视“教化”，孔、孟的政治主张，即可谓是“教化”的政治，作为一种统治之术，教化的实施不仅仅限于学校范围内的教育设施，而且强调各级统治者从自身做起，发挥表率天下的典范作用，并充分考虑各种政事措施的道德影响和教育意义，通过“广教化，美风俗”，进而强化对广大民众的思想控制，建立起稳固的统治秩序。因此，在古代中国，历代统治者无不充分认识到教化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视之为“大务”和“先务”。无疑，从根本上讲，古代中国的教化政策及其一系列相关的教化形式，是为维护社会统治秩序和纲常礼教服务的，但其中又具有丰富而相对成功的教化理论和实践。因此，科学地总结和正确地对待中国古代的教化传统，乃是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而就女子教育来说，虽然，在古代，女子没有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但一些女子自古就接受着形式不同的各式各样的教育。至清末，由于西方男女平等思想的广泛传播和教会女学的日渐发展，以及西方教育制度对人们的启示，要求女子接受学校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于是，女学像一棵破土而出的鲜嫩小草一样，在世纪之交这个“过渡时代”顽强地生长着；此后，随着女子逐渐在小学、师范、中学、实业等学校教育制度方面取得了法定的地位，小学、大学和中学男女同校也相继得以实现。艰难曲折发展的女子教育成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缩影。除女子教育外，在近代中国，自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通过派遣留

美幼童和留欧学生来培养新式人才，使得留学教育得以兴起后，与社会变迁相适应，留学教育几经沉浮，在不同的时期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和特征，而为数众多的留学生成为变革社会的主力军，其中不少人更是活动于教育领域，成为推动教育近代化的有生力量。

《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共分九个专题，由九部独立的著作组成：《中国幼儿教育史》（廖其发主编），《中国小学教育史》（吴洪成主编），《中国中学教育史》（商丽浩主编），《中国师范教育史》（崔运武著），《中国职业教育史》（谢长法著），《中国大学教育史》（刘少雪著），《中国留学教育史》（谢长法著），《中国古代教化史》（张惠芬主编）和《中国女子教育史》（熊贤君著）。本套丛书以理清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自身发展的基本线索为中心任务，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中国教育历史的嬗变轨迹。但鉴于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自身演变的情况各不相同，故对它们的阐述也自然根据其内容的有无或多少而定。如像中学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甚至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都是在近代，尤其是在学制建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所以，有关这些方面的研究我们将侧重点置于近代部分。另外，中国教育史作为一门重要的教育学科，对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在研究中，我们既重视理论性，也强调现实性，以发挥中国教育史应有的服务于社会的功能，增进其普及的效用。整套丛书力求史料翔实，言必有据，结构严谨，观点平实，文字也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流畅。但是，由于辑入丛书的九部独立成书的著作，毕竟出自不同的作者之手，所以我们在写作风格上并不强求完全统一。

《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由江铭、谢长法主编。参加撰写的绝大部分作者在相应承担的有关内容方面，具有多年的研究基础，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告竣。山西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及有关编辑，特别是张沛泓编审，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我们谨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希望，本丛书的出版能够有助于读者对中国从古代到近现代教育的发展及其规律获得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和认识，并从中总结、借鉴我国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当然，我们更热切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

江 铭 谢长法

2005年12月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中国近代大学的初现 \ 4

- 第一节 西学东渐及近代教育形式的出现 \ 4
- 一、与西方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最初接触 \ 5
- 二、近代高等教育在国内的初步尝试 \ 7
- 三、“揠苗助长”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及其隐患 \ 10
- 第二节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最初探索 \ 14
- 一、颁布实施新学制 \ 14
- 二、新学制颁布后高等教育的发展 \ 17
- 第三节 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危机 \ 18
- 一、缺乏必要的思想和观念基础 \ 19
- 二、缺乏必要的教育基础 \ 20
- 三、功名思想严重, 扭曲高等教育的本意 \ 23
- 四、高等教育管理中的过分行政化 \ 25

第二章 中国近代大学的挣扎与演变 \ 27

- 第一节 民国初期的中国近代大学 \ 27
- 一、民国初年的中国高等教育基础 \ 27
- 二、民国初年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困难 \ 30
- 第二节 近代大学向现代大学的演变 \ 36
- 一、确立近代资本主义教育目的 \ 36
- 二、初步建立近代高等教育制度 \ 38
- 三、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 \ 40

四、教会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发展 \ 49

第三章 中国现代大学步入正轨 \ 57

- 第一节 中国现代大学的开端 \ 57
- 一、关于现代大学的宗旨 \ 57
 - 二、改组大学的管理体制 \ 60
 - 三、倡导学术研究的风气 \ 62
- 第二节 留学生回国与大学管理的现代化发展 \ 66
- 一、教育模式的美式化 \ 68
 - 二、学科体系改革的现代化 \ 72
 - 三、管理体制规范化 \ 74
- 第三节 大学现代化发展中的问题与困难 \ 77
- 一、大学发展与扩张中的经费问题 \ 79
 - 二、校长的更换与大学的发展 \ 81
 - 三、大学教育与社会需要的脱节 \ 82
- 第四节 教会大学发展方向的转变 \ 85
- 一、政府对教会大学方针之改变 \ 85
 - 二、教会大学的反应与调整 \ 87

第四章 中国现代大学的崛起与兴盛（上） \ 93

- 第一节 完善现代大学的组织结构体系 \ 93
- 一、加强对国立大学的宏观管理 \ 95
 - 二、加强对私立大学的管理 \ 102
 - 三、把教会大学纳入政府统一管辖范畴之内 \ 110
- 第二节 中国大学的学术化与本土化 \ 120
- 一、提高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平 \ 121
 - 二、中国大学本土化意识的觉醒与发展 \ 132

第五章 中国现代大学的崛起与兴盛（下） \ 138

- 第一节 中国大学的大迁移 \ 138
- 一、向后方撤退 \ 139
 - 二、艰苦环境中的继续发展 \ 148
 - 三、政府对大学的管理与控制 \ 155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学教育 \ 163
- 一、中国共产党对新式大学的早期探索 \ 163
 - 二、抗战时期至建国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学教育 \ 166

第六章	对中国大学现代化过程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 173
第一节	大学与政府的关系	\ 173
	一、政府与大学关系的三个阶段	\ 174
	二、对中国大学与政府关系特点的分析	\ 179
第二节	教会大学对中国大学现代化的贡献	\ 188
	一、教会大学的学术贡献	\ 189
	二、教会大学在促进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贡献	\ 197
结束语	\ 202	
主要参考文献	\ 204	
后 记	\ 209	

目

录

绪论

绪

论

中国本有大学。但中国现代的大学不是传统的大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大学完全是西方近现代大学制度中国化的产物。

19 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列强用军舰和炮火打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大门，国内开明士大夫、政府官僚为了救亡图强，不得不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文化，改造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建立新式近现代大学制度，改造中国传统教育制度，是清末中国学习西方的重要举措之一。因此，中国近现代大学不是对长期封建时代的太学、国子学或是自由学术风气较为浓厚的书院之延续，而是在彻底废除传统教育制度、改革传统教育机构的基础上，通过模仿西方近现代大学制度而建立起的一套全新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机构。模仿、移植来的近现代大学，在不断本土化的过程中，一方面，从主观上没有完全模仿和彻底移植的决心和意识；另一方面，客观上也存在制度形式可以模仿，而制度内涵则难以移植的现实困难。中国近现代大学在模仿和移植的过程中，并不避讳对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某种秉承，并因此而形成了既与模仿的母版不同、也与传统教育制度相隔的中国近现代大学制度。

中国近现代大学制度的产生与形成，大体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 19 世纪后半期。由于中国社会所遭受的民族与政治危机愈加严重，清朝政府不得不把建立近代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作为改革图强的一个主要方面来考虑，这一时期国内出现了一些近代大学的个体——虽然从内容与形式来说，这些新式教育的个体都还无法称为真正的大学，但它们的建设目标与设置方式，开了中国近代新式高等教育的先河。从这个意义上说，在 19 世纪后半期，中国出现了最早近现代大学，其

中既有中国官办的新式大学，如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京师大学堂等；也有教会举办的新式学堂，如登州文会馆、圣约翰书院等。进入20世纪后，清朝政府有了彻底改造中国传统教育的决心，下令改书院为学堂，颁诏实施新学制，甚至废除科举制，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进入近现代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期：京师设立大学堂，各省普遍设立高等学堂，在全国范围内模仿建立近代大学的制度框架自此得到了巩固。但是这一时期的模仿和发展只是浅表性的，西方近现代大学教育的思想与精华并没有被真正移植过来。

第二阶段是清朝灭亡后，中国大学教育进入规范发展阶段。中华民国成立，使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家开始从政府层面对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向产生影响，蔡元培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蔡元培执掌民国教育部后，颁布了一系列规范中国近现代大学发展的政策法令，一方面开启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法制化建设；另一方面也纠正了清末以来中国大学教育名不副实的发展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教会大学由于意识到了中国政府改革传统教育制度的决心，为了继续保持它们在中国本土上的“科学知识代言人”的地位，教会大学在规范建设方面率先走出了第一步，其主要表现是通过向西方政府注册，获得西方承认的大学资格，改变以往通过模仿中国旧制度以获得中国社会认可的传统做法。应该说，正是因为有了教会大学的这一举措，中国本土上开始有了真正的近现代大学教育。

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是中国近现代大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事件，并标志着中国近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进入第三阶段。在此之前，各官办大学仍在延续清末的办学方式、教育内容，新式大学并没有真正得到社会与政府的认可。重塑北京大学的精神，改革北京大学的办学方向，是蔡元培之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对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最卓越的贡献。追求高深学问及与此相伴而生的学术自由精神理念开始在中国大学中有了根芽。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有了大批留学生的加入，中国大学的改革与发展开始进入历史高潮期。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近现代大学的发展进入第四阶段。中国大学的发展历尽艰难。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并没有因此而稳定下来，相反进入了一个军阀混战的动乱时代。大学经常因此而陷入风雨飘摇之中，经费不足和校长的频繁更迭成为影响许多大学正常教学秩序的导火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大学曾有过一段短暂的稳定发展期，中国大学因此而在提高学术水平和促进中国大学教育本土化方面走出了很

重要的一步，人们有理由期望中国大学由此起步，以对中国社会和世界学术发展做出应有的伟大贡献。但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打乱了中国大学的发展计划和发展节奏。日本侵略者不仅破坏了中国大学发展所需要的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而且更为恶劣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是有意识地把中国大学作为毁灭打击的主要对象。中国大学又一次陷入战乱与动荡之中。但是，这一时期的中国大学与中国大学人已相对成熟了，在经历了短暂的停滞期之后，中国大学重新进入正规发展的轨道。

在半个世纪的发展中，糅合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和西方近现代大学特质的中国近现代大学，已经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制度与文化特色。这种制度和他文化特色，使中国近现代大学较为迅速地跨越了从古代向近代、从近代向现代的发展历程，并为中国社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做出了巨大贡献。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大学及中国大学人没有辜负诞生时国家、社会和民族对他们的期望。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说，由于后现代化国家觉醒初期所面临的最大的任务是追赶而不是创新，在中国大学制度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赶上成熟大学的教育和研究水平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中国大学都无法实现教育与研究的完全自主。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大学从建设的初期就进入“异化”状态，大学不是以追求高深学问为目的，而更主要的是要服务于国家独立和民族自强的需要。中国大学在近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这一特点，甚至影响到了今天大学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思路与基本模式。因此，在探究当代中国大学与政府、与社会、与世界同行的关系时，我们禁不住要回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从探询中国大学的近现代化的过程中寻求答案。

本书研究的中国大学，主要是19世纪后半叶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各类正规专科以上高等学校，但以综合性大学为主。在学校性质上包括国立、省立、市立、私立及教会大学，其中国立和教会大学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在研究内容上主要侧重于本科教育，兼涉少量的研究生教育；在地域上，主要是我国大陆的高等学校，没有涉及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

第一章

DIYIZHANG

中国近代大学的初现



4

中国近代大学不是自发产生的，是整个中华民族遭受灭顶之灾后，各界藉以拯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政治举措。因此，与西方近现代大学相比，中国近代大学的产生，第一缺乏知识分子基础，第二缺乏科学基础，第三缺乏社会经济基础，第四缺乏教育基础。因此，中国近代大学诞生之时就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

第一节 西学东渐及近代教育形式的出现

19 世纪中期，随着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势力开始凭借不平等条约逐渐向中国社会渗透，中国的社会形态与民族心态都随着西方势力的日渐进入而开始有显著变化。继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中第一次失败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中的接连失败，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我们在很多方面已经落后于西方。最先被深刻认识到的是西方在军事制备上的先进。为了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清朝政府开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不断设立一些新式官学机构，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福州船政学堂等，把学习西学纳入到官方认可的教育体系之中。同时，一些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的需要，开始在中国内地设立教会教育机构，从事以语言为主的教学活动；而一些传统的教育机构，如书院，也开始或多或少地把部分西学内容引进到正式的教学活动中来。中国传统的教育体系开始向西学开放。

一、与西方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最初接触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清朝政府的大门越打越开，清政府开始与西方国家有了正式的外交接触，开始派遣驻外使者、各类赴外国考察团和留学生。中国对西方社会的了解，不限于对西方人士的主动引进，而开始有了国人自己的亲身感受，从而对推进国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改革，也更加有力。

这些最早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繁华与社会秩序的良好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随着了解的日渐深入，他们超越了国内一般人认为西方国家的胜利是靠武器装备先进的境界，从而认识到西方国家的胜利，靠的不是武器和技术，而是政治与教育制度的先进与发达。曾随日意格率领福建船政学堂留欧学生出使的随员马建忠就坦率地说：“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他如学校建而智士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① 清朝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也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末节也。”^② 而其政教之“本”，又在于普通教育的普及与高等教育的发达。于1866年参加过第一个赴欧洲非正式考察团的斌春在访问欧洲各国时，发现各国“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乡、一邑有小学。……小学曰文科，有四种：一古贤名训；一各国史书；一各种诗文；一文章议论。学者自七八岁学至十七八岁。学成，本学之师儒试之。优者进于中学，曰理科，有三家（年）；初年学‘落日加’，译言察性理以上之学，总名‘斐录所费亚’。学成，而本学师儒又试之，优者进入大学。乃分为四科，而听人自择：一曰医科，主疗疾病；一曰治科，主习译言辨是非之法；二年学‘费西加’，译言察性理之道；三年学‘默达费西加’，政事；一曰教科，主守教法；一曰道科，主兴教化。学成，而师儒又严考阅之”^③。学生在各级学校学习的目的不是为

① 马建忠：《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适可斋纪言》，卷二。

② 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2页。

③ 王锡祺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光绪十七年上海著易堂刻本。

像在国内那样获得官职，而是满足学生个人的职业发展需要，即学者“非仅为士者有学，即为兵为农为商，亦莫不有学”，“文则有仕学院，武则有武学院，工则有工艺院，商则有通商院”，学者入了专门学院之后，“平时所见所闻，莫非专门名家之言，是以习之而无不成，为之而无不精”^①，然后可以保证就学之人能够做到“今日之所讲，即异日之所行，而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之弊，无可虑矣”^②，对近现代高等教育制度有了最初的认识。还有人观察到，日本已经开始模仿和实行了西方的高等教育制度，“东京太学生徒，凡百余人，分法、理、文三部，法学则英吉利法律、法兰西法律、日本古今法律。理学者，化学、气学、重学、数学、商贾学、矿学、画学、天文地球学、动物植物学、机器测算学。文学有日本史学、汉文学、英文学。以四年为卒业，分其优绌而定为等级”^③。



6

在有了对西方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初步认识和接触以后，这些早期出国者逐步提出了学习和模仿西方先进教育制度的设想。他们的设想还不是建立完整的近代教育制度，而只是对国内教育制度的部分“修正”或“完善”。如王之春曾提出：“将西国有用之书，条分缕析，译以华文，刊行各直省书院。每院特设一科，请精于泰西之天算、地球、船政、化学、医学及言语文字、律例者为之教习，或即以出洋学习之学成返国者当之。其学徒则选十岁以上，廿岁以下……又或于科岁两试录文武俊秀，择其有志西学，年亦相当，就其性之所近，专习一科……既可以收当务之益，复不背于圣人之教，而诸生之数奇不偶者，又别于一途，以博取功名，谁不乐于从事哉！……粤东与苏州新设有两塾，专教西语、西算、设线、按报、测电诸学，设额虽少，可以渐推而渐广，为洋务培植人材，正未可量。”^④郭嵩焘在帮助家乡学使朱肯甫兴建新式学堂时，认为在办学方向上“总须异乎今世之书院学馆，而后为不负此举也”，“以求有益乡里，为陶成人才之资”；在具体的办学规章上，要“讲求微实致用之学”，根据他所了解的英法两国学馆课程的设置情况，“摘取其大要”^⑤。

①③④王锡祺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光绪十七年上海著易堂刻本。

② 朱有琳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⑤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07、919页。

二、近代高等教育在国内的初步尝试

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国内对西方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认识与国内尝试举办近代高等教育机构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一部分人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受到了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威力;另一部分人则通过国内各种途径,在对国内传统教育制度反思的基础上,在实践上开始借用西方近代高等教育的模式,对中国传统教育机构乃至教育制度进行改造。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机构从此开始萌芽。其中,盛宣怀在天津创办了天津中西学堂和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张之洞在湖北创建了湖北武备学堂等。这些新式学堂的设学宗旨与传统的教育机构有很大的不同,即其设学的出发点是培养国内新兴武备、矿产行业所需要的专业人才,盛宣怀在“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禀”中说:“日本维新以来,援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不特陆军海军将弁皆取材于学堂,即今之外部出使诸员,亦皆取材于律例科矣。制造枪炮开矿造路诸工,亦皆取材于机器工程科地学化学科矣。”为此,他认为,“当赶紧设立头等二等学堂各一所”,“头等学堂功课,必须四年,方能入选专门之学”。其中头等学堂修业年限定为四年,分为法律、采矿冶金、土木工程、机械四科,“招已通大学堂第一年功夫者,精选三十名列作末班。来年即可升列第三班,并取二等之第一班三十名,升补头等第四班之缺”,“至第四年年底,头等头班三十名,准给考单挑选出堂”。从头等学堂毕业的学生,“或派赴外洋,分途历练;或酌量委派洋务职事”。并且,盛宣怀认为,“此外国所谓大学堂也”^①。中西学堂于光绪二十一年八月(1895 年 10 月)创立,专门学分为五门,每门课程规定如表 1-1。

表 1-1 天津中西学堂头等学堂专门学及课程要求

专门学	课程要求
工程学	演习工程机器、测量地学、重学、汽水学、材料性质学、桥梁房顶学、开洞挖地学、水力机器学
电学	深究电理学、讲究用电机理、传电力学、电报并德律风学、电房演试
矿务学	深奥金石学、化学、矿物房演试、测量矿苗、矿物略兼机器工程学
机器学	深奥重学、材料力学、机器、汽水机器、绘机器图、机器房演试
律例学	大清律例、各国通商条约、万国公法等

^① 朱有藏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90~491 页。

资料来源：“盛宣怀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禀（附章程、功课）”，见朱有璹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94页。

天津中西学堂的设立，在学习和模仿西方近代高等教育制度方面，比建立新式书院还要更进一步。建立新式书院是对传统教育制度的改造，而中西学堂的创建则是对传统教育制度的彻底抛弃。

经过甲午中日战争的又一次大败和激烈的政治斗争之后，清朝政府在模仿西方近代高等教育制度方面也走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创设了京师大学堂。

8  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是朝廷上下自兴洋务运动以后的又一项重大的学习西方发达国家自强救国的举措，“泰西各国……其都城之所设大学堂，规模闳整，经费充盈，教习以数百计，生徒以数万计。其学有分四科者，五科者，六科者……遂以争雄竞长，凌抗中朝”，“当兹事变之日，需才孔亟，以蓄艾卧薪之意，为惩前毖后之方，亟应参仿各国大学章程，变通办理，以切时用”。同时，也是对洋务学堂“囿于一才一艺”的改进，很多人认为，“办理垂数十年，欲求一缓急可恃之才而竟不可得”，追究其原因，“此中国旧设之学堂，不能仿照办理也”^①。因此，京师大学堂从创设之始，就很明确要“参用泰西学规”，“选择学赅中外之士”“认真训迪”，以“广育人才，讲求时务”^②。因此，《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功课设专门学十种，“俟溥通学卒业后，每学生各占一门或两门”。

天津中西学堂和京师大学堂分别是中国近代公立、国立高等教育的开端。但不幸的是，20世纪初的血雨腥风阻断了它们的发展，19世纪末期艰难诞生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就像一棵小小的嫩芽，刚出土就遭到了严霜的袭击。

与国人对西方近代高等教育机构的初步尝试相协调的是，由教会团体或机构举办的教会教育机构，也开始在办学宗旨与办学方向上向近代高等教育机构转变，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机构应该是从教会高等教育开始的。

进入19世纪后半期，随着传教士势力的不断扩大和教会学校的兴起，传教士的思想和行为也发生了快速变化：19世纪70年代时还在讨

① 朱有璹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23页。

② 朱有璹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39页。